

回流农民工家庭成员居住区位的离合和城镇化

郭卓^{1,3}, 朱宇^{2,3*}, 林李月^{1,4}, 柯文前^{1,4}, 钱宏胜^{1,3}

(1. 湿润亚热带生态地理过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福州 350117; 2. 上海大学人口研究所暨亚洲人口研究中心, 上海 200444;
3.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福州 350117; 4.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 福州 350117)

摘要:居住地选择是农民工回流后必然面对的现实问题,开展回流农民工家庭成员居住区位的研究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2022年河南省唐河县604份调查问卷数据,采用描述统计和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探讨农民工回流过程中其家庭成员在居住区位上的分离、聚合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将近6成的回流农民工其家庭成员仍然处于分离状态,这些家庭部分延续了在流动过程中的跨地区生计,部分则在县域范围内产生了新的跨地区生计类型,呈现出“分而不离”的特征;② 在实现聚合的回流农民工家庭中,半数家庭居住在户籍地县域城镇,实现了家庭成员的城镇化,而居住在农村的处于“半工半耕”的家庭则蕴含着县域城镇化发展的潜力;③ 回流农民工的年龄越小、家庭人数越少、月均收入水平越高、距县城中心越近,越有可能实现家庭聚合;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人数越少、劳动力人数越多、已购房或建房、月收入水平越高、在外流动时间越久、回流时间越长,居住区位距县城中心越远者,其家庭越有可能在城镇聚合。研究结果可为地方政府制定引导农民工回流与推进就近城镇化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回流农民工;家庭聚合;家庭分离;居住区位;县域城镇化

伴随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1],以及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战略的推进,东部城市吸纳劳动力的“拉力”减弱,来自中西部地区人口的回流现象渐成趋势^[2-4]。一般来说,回流至户籍地村庄重新安家,是回流者的一个主要选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回流农民工中,除了返回原户籍地村庄与家人聚合以外,家乡的城镇地区也是他们的重要回流地^[5-6],这些回流者可能在城镇与家人实现聚合,也有可能仍然与家人在空间分布上处于分离状态。这种状况打破了传统认知中的“回流即在户籍地农村聚合”的预期,向人们呈现了回流农民工的另一种实践,即当前中国农民工回流过程也是其家庭成员居住区位的重构过程,在此过程中,回流并不意味着在原户籍地农村聚合,

而是出现了新的聚合区位或者是分离方式^[7]。那么,在农民工回流过程中,哪些家庭仍然处于分离,哪些家庭已经实现了聚合?仍处于分离状态的家庭成员将如何选择其居住区位?在实现聚合的家庭中,有多少实现了在城镇聚合的目标?家庭的聚合与否、聚合区位受哪些因素影响?回答这些问题对拓展和深化人口流动过程的研究、对中西部地区县域城镇化的发展中如何吸纳人才、留住人才,使人力资本实现从“回流到留住”的转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迄今相关领域关于农民工家庭分离和聚合的研究为考察农民工回流过程中家庭成员的区位选择奠定了重要基础。研究表明,家庭是农民工流动就业的基本决策单元^[8]。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

收稿日期:2023-06-04;修订日期:2023-08-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80,41971168);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项目(DP230103060);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1J01145)。[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41971180 and 41971168;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Project, No. DP230103060;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Fujian Province, No. 2021J01145.]

第一作者简介:郭卓(1998—),女,河南南阳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人口与城乡发展。E-mail: guozhuo0123@163.com

*通信作者简介:朱宇(1961—),福建闽清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迁移流动、城市化与区域发展。

E-mail: zhu300@shu.edu.cn

引用格式:郭卓,朱宇,林李月,等. 回流农民工家庭成员居住区位的离合和城镇化[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12): 2377-2387. [Guo Zhuo, Zhu Yu, Lin Liyue, et al. Separation, convergence, and urbanization of the residential location of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family member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42(12): 2377-2387.] DOI: 10.18306/dlkxjz.2023.12.008

大量农民工由乡村向城市、由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流动,然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使农民工往往只能在工作报酬和稳定性差的劳动密集部门工作^[9]。在此条件下,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能力不足,对流出地家庭资源还存在着很强的依赖,因此在流迁过程中往往采取乡城两栖、甚至多栖生计策略,并由此产生了分离家庭^[10-13]。通过这一策略,农民工既可以在城市获得其家庭生活所需要的收入,又可以依靠其农民身份使用家乡的房屋、土地等资源,获取农村的经济利益。但近年来,上述基于经济理性解释的分离家庭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农民工家庭的城乡分离带来了诸如父母长期缺乏对留守儿童的照顾,使得留守儿童家庭的未来发展存在问题的负面影响^[14-15]。事实上,随着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的发展,农民工逐渐意识到把家庭成员分离在两个地方或者多个地方并不理想,因此也会想尽办法寻求家庭聚合^[16]。近年来农民工在流入地城镇工作生活状况的改善也在不同程度上促成了许多家庭这种寻求家庭聚合的努力^[17]。

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开始探究农民工家庭聚合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一方面,以在流入地城市的聚合为切入点,一些研究考察了农民工在流入地城市家庭聚合的过程、特征变动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农民工在流入城市的家庭呈现出规模不断扩大、结构趋向核心化的特点^[18-19],这种特点是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等多重要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8,20-21]。其中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等因素对其有正向影响,而在外流动时间、子女数量、往老家的汇款金额、在流入地无法平等享受各类保障资源等因素对其具有负向影响。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以县域为研究单元,探究农民工家庭在户籍地县城聚合的过程。研究发现,农民工家庭在其居住的乡村地域与其所在县的县城地域间践行着“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并通过这种模式逐渐实现家庭在县城的聚合^[22-23]。但这种聚合并非一次就能完成,而是在城乡之间不断往返和试探,是一个长期、反复、曲折的过程^[24],这种农民在城镇实现家庭聚合的过程分为3个阶段:为进城购房准备资金的起步阶段^[25-26];年轻一代农民进入城镇,但就业不稳定、收入不高,缺乏稳定社会保障的过渡阶段^[27-28];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在县城生活趋于稳定,其父母“既可进城,也可返乡”的完成阶段。

上述研究无疑丰富了学术界对农民工家庭成员居住区位的认识,然而这些研究要么考察流入地农民工家庭聚合情况,要么考察在户籍地县域范围内的农民工家庭聚合情况,尚未将回流地农民工与家庭聚合两者相结合,综合考察回流农民工家庭成员的居住区位。事实上,无论是在流入地还是在户籍地县城聚合,流动人口的回流都是其家庭城镇转变和人口移动转变的一环;近期的研究表明,这一环节是一个复杂多样的过程,农民工回流过程中其家庭成员居住区位所呈现的、在原有跨地区生计下的分离状态向实现聚合之间的不同转变路径,正是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突出表现,需要在不同背景下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以充实和完善对这一城镇转变^[29-30]和人口移动转变^[31]重要一环的认识^[32]。因此,本文以河南省唐河县为研究区域,基于实地调研数据,通过描述性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农民工在回流过程中的家庭成员居住区位的特征及其演变,并分析回流农民工家庭聚合与分离的影响因素,以期丰富对流动人口回流机制的认识,拓展和深化对中国的城镇转变和人口移动转变的研究,并为地方政府制定引导农民工回流与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1 概念界定及研究设计

1.1 概念界定

参考相关文献分析^[33],并结合研究目的和实地调研结果,本文根据家庭成员居住区位将回流农民工家庭分为分离家庭和聚合家庭。其中分离家庭包括县内分离家庭(回流农民工所有的家庭成员目前均在同一县域范围内的不同区位居住)和县外分离家庭(回流农民工所有的家庭成员目前部分在县域范围以外、部分在县域以内居住)两类;聚合家庭指回流农民工全家居住在一起,根据居住区位又分为农村聚合家庭和城镇聚合家庭两类。另外,本文关注的是扩展家庭及其成员,即包括配偶、父母、子女,但不包括其他旁系血亲成员。

1.2 研究区概况

中西部地区是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出地和回流地。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末河南省常住人口为9937万人,居全国第3位;流出口1610万人,居全国首位。近年来,中国农民工回流现象明显,河南省作为中国劳动力输出大省,也成

为农民工回流大省。唐河县是河南省南阳市下辖的县级行政单位,是典型的全国粮食大县,2020年末全县户籍人口147.61万人,常住人口105.44万人;城镇化率为44.68%,低于全省城镇化率(55.43%)。自2004年建立工业园区,2015年大规模招商引资以来,唐河县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近3年返乡人员约为1.5万~2万人,周边乡镇的回流农民工开始选择在唐河县就近工作,一些回流农民工也逐步在县城买房。在当前农民工回流趋势下,选择该地区有一定的代表性。

1.3 数据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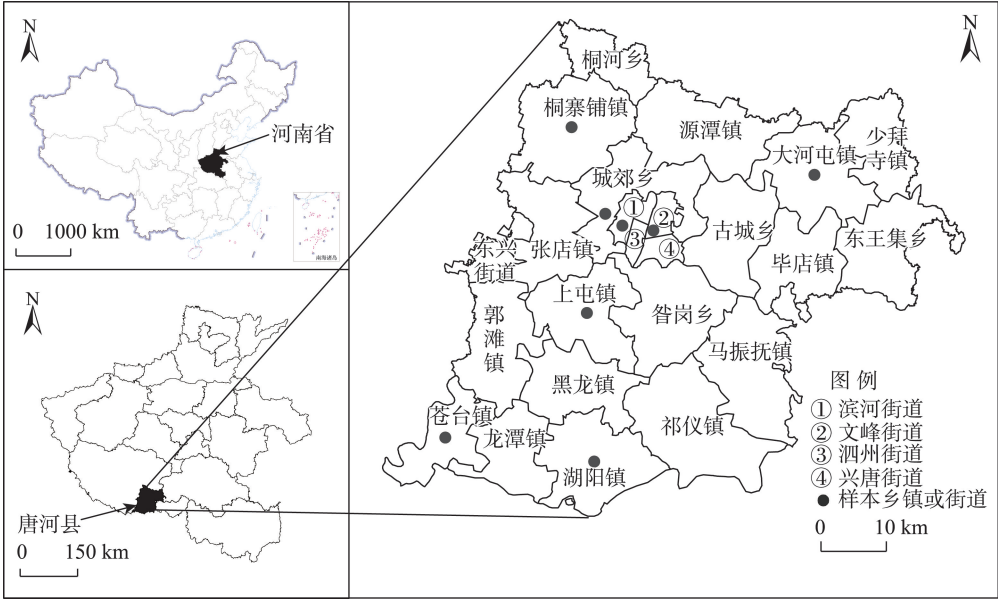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2022年2—3月在唐河县进行的实地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初次流动、回流前的最后一次流动和回流后的就业、住房以及家庭成员的空间关系,共计4个方面65个属性。问卷调查的对象为农业户口、户籍地属于唐河县,曾离开唐河县到唐河县以外区域生活或工作1年以上,目前回到唐河县居住超过1年以上的回流农民工。调查根据河南省唐河县各乡镇街道的地形、城郊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农民工分布等因素,选取了2个街道、6个乡镇(图1),并按照距街道和乡镇中心的远近,每个街道和乡镇各抽取2个社区或自然村,共计4个社区、6个乡镇区和12个自然村。本次调查共发放650份问卷,收回640份问卷,剔除36份无效问卷后,共获得有

效问卷604份,问卷有效率为94.38%。

1.4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计

为了解决农民工回流后家庭是处于分离或是聚合、聚合后的区位选择这两个问题,本文采取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影响因素的识别。首先,识别出回流农民工家庭聚合与否的样本;其次,将回流农民工家庭聚合区位划分为农村聚合和城镇聚合。将回流农民工家庭是否实现聚合和是否在城镇实现聚合分别设置为“是、否”二分类变量,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具体来讲,首先构建回流农民工家庭是否聚合的模型(模型一),分析回流农民工实现家庭聚合的影响因素;其次,构建家庭聚合区位选择的回归模型(模型二),分析家庭聚合区位偏好的影响因素。

在迄今关于农民工家庭聚合与分离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其自变量涉及农民工的个体特征^[34]、家庭特征^[35-37]、流动特征和居住地特征^[38-40]。首先,个人特征主要包括个体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作状况等。行为心理学认为,人的行为建立在个人特质的基础上,受自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人力资本状况的制约,进而对家庭的分离和聚合产生重要影响。其次,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人数、劳动力人数、是否购房或建房、家庭的耕地数量、家庭月均收入水平等因子。家庭社会支持理论认为,家庭成员之间具有天然的社会支持功能,个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0)4630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1 样本点区位
Fig.1 Location of the survey sites

人决策往往服从于家庭决策。因此,家庭人数、劳动力人数、家庭收入水平等可能影响着家庭的分离与聚合。同时,家庭耕地面积通过影响家庭在村庄的农业经济收益,间接对家庭成员居住区位产生影响,而是否建房或购房则对家庭成员居住区位产生直接影响。再次,流动特征主要包括在外流动时间、回流时间、是否为省际回流等因子。务工作为农民工个体重要的人生经历,不仅是积累财富的过程,也是人力资本提升、思想观念变化的过程,因此,在外流动时间、回流时间等因素对农民工回流后是否与家庭成员聚合、聚合的区位选择都有重要的影响。另外,已有研究表明,省际回流和省内回流农民工选择的回流区位和特征会存在差异^[6],因此将是否为省际回流这一因素也纳入模型中。最后,回流地特征包括回流后的居住地距离县城中心的远近这一因子。县城中心一般是经济、文化的集中地,家庭是否聚合、聚合的区位选择也会受到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因此将其纳入实证分析框架。这些影响因子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2 回流农民工家庭成员的居住区位特征及其转变

2.1 回流农民工家庭成员的居住区位特征

如表2所示,回流农民工家庭成员的居住区位仍然以分离为主,其中县外分离占比最高。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显示,所有样本中家庭聚合型共255人,占总样本数的42.22%;家庭分离型共349人,占总样本数的57.79%。农村聚合家庭、城镇聚合家庭、县内分离家庭和县外分离家庭分别占比20.86%、21.36%、22.19%、35.60%。可见,农民工回流后绝非是简单的“回流即聚合”,从农民工个体的回流到家庭成员的永久定居和聚合,中间仍要经历多次不同形式的循环流动和跨地区生计安排^[41]。

2.2 回流农民工家庭成员居住区位类型的转变

2.2.1 回流农民工家庭呈现出新的跨地区生计特征

调查显示,农民工回流后家庭成员县外分离的比重为35.60%,与务工前相比增加了25.50个百分点(图2),这表明农民工即使回流至户籍地县域范围

表1 模型变量及定义
Tab.1 Variables and their definition

变量名称			模型一		模型二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家庭是否聚合	否=0;是=1	0.422	0.494	—	—
	家庭聚合的区位	农村聚合=0;城镇聚合=1	—	—	0.506	0.501
个人特征	性别	女=0;男=1	0.392	0.489	0.420	0.494
	年龄/岁	连续变量	40.679	9.356	39.549	8.470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 高中=3;大专及以上=4	2.204	0.860	2.247	0.912
	婚姻状况	单身=0;在婚=1	0.934	0.249	0.918	0.275
家庭特征	工作状况	否=0;是=1	0.717	0.451	0.769	0.423
	家庭人数/人	连续变量	4.866	1.253	4.624	1.150
	劳动力人数/人	连续变量	2.575	1.002	2.482	0.975
	是否购房	否=0;是=1	0.546	0.498	0.494	0.501
	是否建房	否=0;是=1	0.333	0.472	0.310	0.463
	家庭耕地数量/亩	连续变量	9.263	40.138	9.781	43.704
	月均收入水平/元	2000元以下=1;2000~3999元=2;4000~5999元=3; 6000~7999元=4;8000~9999元=5;10000~19999元=6;20000元及以上=7	3.974	1.689	4.153	1.613
流动特征	在外流动时间/a	连续变量	7.871	5.876	7.733	5.478
	是否为省际回流	否=0;是=1	0.840	0.370	0.820	0.382
	回流时间/a	连续变量	7.195	6.146	7.216	5.934
回流地特征	距离县城中心远近/km	较近(<18 km)=1;中等距离(18~36 km)=2;	1.874	0.790	1.757	0.766

表2 回流农民工家庭成员的居住区位类型
Tab.2 Residential location types of family members of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类型	人数/人	占比/%	累计比例/%
农村聚合家庭	126	20.86	20.86
城镇聚合家庭	129	21.36	42.22
县内分离家庭	134	22.19	64.40
县外分离家庭	215	35.60	1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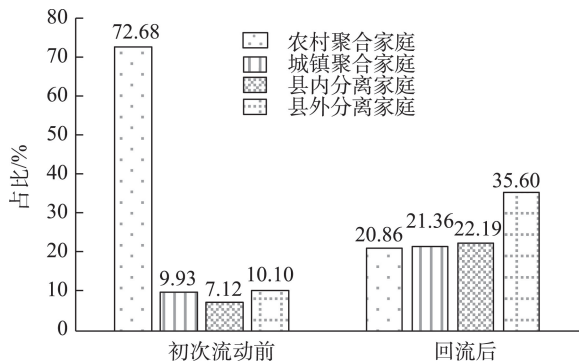


图2 回流农民工家庭成员居住区位演变

Fig.2 Evolution of residential location of family members of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内,仍有部分家庭成员在县域外流动,家庭依然分离。这部分群体以女性和老年人口为主。对于女性来说,回流的目的是为了未成年子女教育和照料老人,而其丈夫则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务工,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报酬,抵御家庭将来会面临的风险。但由于这些女性回流后就业一直无法落实,这使得“家”“业”难以在回流地兼得,待子女长大有再次外出的可能^[34]。“要不是因为生小孩、带小孩,我早就出去打工了,家里面(找工作)一听说我有孩子(如果工作,每天需要请假接送孩子),就不招了”(葛女士,36岁,无职业)。老年人口则是因为年老和家庭责任无法留在城市而返回农村老家,他们为子辈家庭提供基本的食物,并随时与流动在外的家人联系。“我原本在城里照顾儿子一家人,但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儿子就把孙子留到老家,我和老伴照顾”(刘女士,63岁,无职业)。

农民工回流后其家庭成员除了维持以往的跨地区生计之外,还产生了县域范围内的“新跨地区生计”现象。如图2所示,农民工回流后家庭成员县内分离的比重为22.19%,较务工前增加了15.07个百分点。这类家庭中,居住在农村的家庭成员组合主要为与父母和子女同住,而居住在城镇的家庭成员组合主要为独居和与配偶居住两类。我们在走

访过程中也发现,此类回流农民工家庭成员分工明确,尤其是在县城或乡镇工厂务工的回流农民工大多数选择居住在工厂或者夫妻双方工厂附近租房。这种方式既可以获得一份较为稳定的收入,又可以照顾孩子上学,定期返乡照看年迈的父母。在交通日益发达、工业基础日渐完备的县城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农民工回流后其家庭成员这种在居住安排上的短距离跨地区生计成为一种重要选择。这种居住格局决定了家庭成员日常在城乡之间频繁流动,其不仅在城乡融合中充当“粘合剂”的角色,而且有利于回流农民工家庭生计进一步向县城转移。“我和我爱人住在厂里提供的宿舍里,周末的时候回老家看看孩子。这(县城)离家近,工资低点也能接受”(王女士,42岁,制造加工业)。

2.2.2 回流农民工的聚合家庭为县城城镇化发展提供动力

与初次流动前家庭聚合的居住区位相比,回流后农民工家庭聚合的区位产生了向城镇转移的趋势。调查结果显示,完全居住在城镇实现家庭聚合的回流农民工与初次流动前相比,增长了11.43个百分点(图2)。在这类家庭中,68.22%的居住类型为购买商品住房,31.78%为租房居住。全家居住在城镇既可以有较为便利的生活、从事非农工作,又可以保障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与教育。我们在调查时发现,该部分群体一方面在外工作有了积蓄,能够支付得起城镇的房价,通过购买房屋,实现举家搬迁;另一方面,由于常年在外务工,对农用地的种植不熟悉,并且习惯了从事非农工作和城市的便利生活,对城市产生依赖,因此出现了家庭聚合型的居住区位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的现象。在访谈中,一些回流者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在福州主要是做装修工作,当时打听到唐河县的装修和福州的工资并没有差很多,就打算回来了。县城的房价相对来说也能负担得起,而且离家近,逢年过节回(老)家看看”(郭先生,50岁,装修工人)。

与在城镇实现聚合的农民工家庭占比增加相反,在农村实现聚合的农民工家庭由初次流动前的72.68%降至20.86%(图2)。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选择居住在农村的回流农民工家庭大幅度下降,却呈现出不同于初次流动前全家均务农的生计方式:①部分农村地区由于交通便利,回流农民工既可以从事非农工作,又可在农忙时节打理自家土地;②回流农民工由于在外获得了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

从而选择在家乡附近创业(如从事规模化的农业种植),以实现家庭在农村聚合。许多被访者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平时我就在村口的小饭店当服务员,我老公就在附近开车(当司机),家里又种了几亩地”(李女士,45岁,饭店服务员);“外出打工攒了点钱,想回来照顾父母,就在这边承包了几亩地,用来收粮食,虽然收入不太稳定,但是全家住一起,够吃够花也挺好”(王先生,42岁,创业者)。这与以往研究认为即使回流农民工选择回到农村,他们也会从事更为体面的非农工作的观点相符合^[42]。这些现象表明,回流农民工即使在农村实现家庭聚合,但这种半工半耕现象正是不完全城镇化的一种体现,是回流地区推进城镇化发展的着力点。

3 回流农民工家庭成员居住区位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回流农民工家庭是否聚合的影响因素

如表3所示,模型一考察了全部回流农民工家庭是否聚合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仅部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回流地特征对回流农民工家庭聚合有显著影响,而流动经历等层面的因素对此无显著作用。

首先,在个人特征方面,年龄对家庭聚合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的回流农民工,其家庭成员越倾向于分离。这是因为,一般来说,年龄越大的回流农民工,其家庭成员越多,那么家庭成员在家庭中具有的社会分工越明确,也就越容易采取城乡两栖的生计策略,从而导致家庭分离。受教育水平却对农民工回流后家庭的聚合或分离影响不显著,表明仅就家庭成员的聚合而言,人力资本尚未发生作用。其次,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人数和家庭月收入水平对回流农民工家庭聚合有显著影响。家庭人数对回流农民工家庭聚合呈现出负向影响,即家庭人数越少,其全家聚合的概率越高;家庭月收入对回流农民工家庭聚合具有正向影响,与高收入家庭相比,中低收入家庭实现聚合的概率更小。这是因为收入越低,越难以维持生活开支,而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报酬,导致部分家庭成员不得不选择外出,这也符合家庭社会支持理论。再次,相对于距离县城偏远的回流地,居住在近距离和中等距离的回流者更易实现家庭成员的聚合。一般来说,距离县城越近,越容易在县城及周边找到合适的非

表3 回流农民工家庭成员居住区位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Tab.3 Regression result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esidential location of family members of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系数B	Exp(B)	系数B	Exp(B)
性别(参照组:女)				
男	0.279	1.322	0.264	1.302
年龄	-0.034**	0.967	-0.047	0.954
受教育水平(参照组:大专及以上)				
小学及以下	0.277	1.319	-2.915***	0.054
初中	-0.048	0.953	-2.469**	0.085
高中	-0.335	0.715	-2.140*	0.118
婚姻状况(参照组:单身)				
在婚	-0.097	0.908	-0.964	0.381
是否从事非农工作(参照组:否)				
是	0.041	1.042	0.320	1.377
家庭人数	-0.288***	0.749	-0.299*	0.741
劳动力人数	-0.118	0.889	0.420*	1.522
是否购房(参照组:否)				
是	-0.229	0.795	0.988**	2.686
是否建房(参照组:否)				
是	0.047	1.048	1.114**	3.046
家庭耕地数量	-0.020	0.998	0.100	1.010
月收入水平(参照组:20000元及以上)				
2000元以下	-2.578***	0.076	-18.984	0
2000~3999元	-1.539	0.215	-0.585	0.557
4000~5999元	-1.166*	0.311	1.232	3.429
6000~7999元	-1.693*	0.184	1.019	2.77
8000~9999元	-1.614*	0.199	2.782*	16.152
10000~19999元	-1.633*	0.195	2.181*	8.86
在外流动时间	-0.002	0.998	0.071*	1.074
是否为省际回流(参照组:否)				
是	-0.187	0.829	-0.403	0.668
回流时间	0.024	1.024	0.077*	1.08
距离县城中心远近(参照组:较远)				
较近	0.772***	2.163	-1.248*	0.287
中等距离	0.469*	1.598	-0.445*	0.641
常数	4.008***	55.014	1.045	2.845
-2倍对数似然值	756.552		210.900	
Nagelkerke R ²	0.139		0.571	
卡方	66.081		142.570	

注: +、*、**、***分别表示 $P<0.1$ 、 $P<0.05$ 、 $P<0.01$ 、 $P<0.001$ 。

农工作,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和教育资源也相对发达,家庭就越容易聚合。

3.2 回流农民工家庭聚合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如表3所示,模型二考察回流农民工家庭在城

镇实现聚合的影响因素。首先,从个体特征来看,受教育水平对家庭聚合区位有显著影响。与大专及以上学历相比,实现聚合的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回流农民工家庭更倾向于居住在农村而非城镇,表明人力资本对家庭在城镇实现聚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其在单纯的家庭成员聚合中无显著影响的事实形成鲜明对比,表明非农就业和人口城镇化对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有较高要求^[43]。

其次,从家庭特征来看,家庭人数、劳动力人数、家庭月均收入、是否购房和是否建房均对在城镇实现家庭聚合有显著影响。家庭人数越多,越倾向于在农村实现聚合,而劳动力人数越多,家庭月均收入水平越高,则越倾向于在城镇实现聚合。这是因为与较低收入水平者相比,月均收入在8000元及以上的家庭具备在城镇生活的更好经济条件,因而倾向于在城镇实现聚合,以享受城镇较高的生活水平和教育、医疗资源条件;而人数较多的家庭,其在城镇生活的成本更高,不利于其在城镇落脚;而家庭劳动力人数较多则就意味着家庭有更多收入来源,从而使家庭有能力追求城镇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也符合新迁移经济理论的假设。与未购房或建房的回流农民工家庭相比,已购房或建房的家庭则倾向于在城镇聚合,这说明拥有城镇住房是回流农民工家庭在城镇聚合的一个重要动力。

再次,在流动特征方面,在外流动时间和回流时间均对在城镇实现家庭聚合有显著影响,而农民工家庭聚合区位与省际或省内回流并无显著关系。具体来讲,曾经在外流动时间越久,回流时间越长,家庭越可能在城镇实现聚合。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在外流动时间越久,人力资本得到提升,回流后更倾向于选择非农工作^[43],与家人在城镇实现聚合,而回流时间越久,对整个回流地的就业环境和居住状况了解越深,选择非农工作和城镇便利的居住条件的可能性越高,从而实现家庭的城镇聚合。

最后,在回流地特征方面,与距离县城中心较远相比,距离县城中心较近和中等距离的家庭更倾向于在农村聚合。这可能是因为,较近距离和中等距离与县城的交通更为便捷,回流农民工家庭将居住地迁往城镇的需求较小,而远距离的农村交通不便,回流农民工家庭选择便捷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而迁往城镇中心的需求较大^[9]。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河南省唐河县调查数据,探究了回流农民工家庭成员居住区位的特征、影响因素,以及与县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1) 近6成的回流农民工家庭未实现聚合,家庭成员仍处于县内分离或者县外分离状态。处于县内分离的家庭成员组合,居住在农村的主要为与父母和子女同住,而居住在城镇的主要为独居和与配偶居住两类;处于县外分离的家庭成员组合,其中居住在县域内的主要为女性和老人,而流动在外的主要为家庭中的男性劳动力。县内分离家庭成员在城乡之间频繁流动,这种“分而不离”的状态,既是城乡融合的“粘合剂”,又是家庭在城镇实现聚合的“序曲”;而县外分离则呈现出多样性——既可能实现在流入地的聚合,也有可能实现在流出地的聚合。

(2) 实现聚合的回流农民工家庭,半数的居住区位由外出务工前的农村转移到了城镇,实现了家庭城镇化的目标,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人力资本。但即使是居住在农村,大多数的回流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处于“半工半耕”阶段,这是不完全城镇化的一种体现,但也恰恰表明,回流农民工在农村实现家庭聚合这一现象蕴含着城镇化发展的巨大潜力。

(3) 回流农民工家庭成员居住区位的影响因素围绕是否聚合和聚合区位选择2个方面展开。是否聚合受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回流地特征3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呈现出回流农民工年龄越小、家庭人数越少、家庭月收入越高、居住区位距县城中心越近者,其家庭聚合发生的可能性越大的规律。聚合区位选择则主要受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流动特征和回流地特征4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呈现出回流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人数越少、劳动力人数越多、已购房或建房、家庭月均收入越高、在外流动时间越久、回流时间越长、居住区位距县城中心越远者,其家庭聚合区位为城镇的可能性越大的规律。

与以往研究关注农民工在流入地实现家庭聚合、以促进流入地城市发展的视角相比,本文重点关注回流农民工在回流地的家庭离合现象,为中西部地区县城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突破点。研究表明,回流农民工家庭聚合不是一步到位(回流即家庭实现聚合)的过程,家庭聚合的区位也并不仅

限于户籍地农村这一单一选择,而是一个多样而复杂的结果。本文不仅丰富了对迁移流动人口回流过程和路径选择的认识,深化了对新时期回流人口家庭的研究,而且实证案例表明回流农民工家庭成员居住区位有着尚未被城镇转变和人口移动转变理论所揭示的复杂而独特的规律,且突出表现在回流人口由于在家庭居住区位上的分化,使得其内部在促进回流地城镇化发展的作用上呈现多元分化的局面。这种实证案例对于拓展和深化对城镇转变和人口移动转变理论的认识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中西部地区以县域为载体的回流城镇化已逐步显现^[4]。为促进这一进程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正视回流农民工家庭成员居住区位的多样性,将回流农民工家庭需求作为相关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第一,县内分离型家庭在经济来源、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等层面兼具城乡要素。这种“城乡两栖”的生计模式必然会对县域内旧有的社会治理体系提出新需求,政府部门在相关政策的制定上需予以应对。第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制定合理的住房政策。如前所述,由于人力资本和购置房产对于家庭能否在城镇实现聚合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应为农村聚合家庭中的劳动力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制定合理的住房政策,引导家庭向城镇转移。第三,完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加快公共服务资源合理配置。地方政府应当加大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教育资源水平,推进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以保障城镇聚合家庭的权益。

此外,本文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后续研究继续完善。首先,本文主要从回流人口微观个体的角度来分析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但除此之外,区域层面的因素,如流出地的经济发展、政策制定等也影响回流农民工家庭成员的离合。其次,由于本文所用问卷数据并未包括一些可能的其他变量,这些潜在的影响因素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展开分析。另外,受样本数量和调查地区的影响,本文所得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地区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孙晓华,郭旭,王昀. 产业转移、要素集聚与地区经济发展[J]. 管理世界, 2018, 34(5): 47-62, 179-180. [Sun Xiaohua, Guo Xu, Wang Yun. Industrial relocation, elements 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8, 34(5): 47-62, 179-180.]
- [2] 林李月,朱宇,柯文前. 城镇化中后期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形式的转变及政策应对[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12): 2054-2067. [Lin Liyue, Zhu Yu, Ke Wenqian. Changes in the form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in China an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sponses at the late-intermediate stage of urbanization.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12): 2054-2067.]
- [3] 段成荣,刘涛,吕利丹. 当前我国人口流动形势及其影响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 2017(9): 63-69. [Duan Chengrong, Liu Tao, Lv Lidan.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population flow and its influence.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2017(9): 63-69.]
- [4] 罗小龙,曹姝君,顾宗倪. 回流城镇化: 中部地区城镇化开启新路径[J]. 地理科学, 2020, 40(5): 685-690. [Luo Xiaolong, Cao Shujun, Gu Zongni. The returning-migrant-induced urbanization: The new path of urbanization in Middle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5): 685-690.]
- [5] 张甜,朱宇,林李月. 就地城镇化背景下回流农民工居住区位选择: 以河南省永城市为例[J]. 经济地理, 2017, 37(4): 84-91. [Zhang Tian, Zhu Yu, Lin Liyue. The residential location choices of returned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ntext of local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Yongcheng City in Henan Province.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37(4): 84-91.]
- [6] 高更和,曾文凤,刘明月. 省际流动农民工回流区位及影响因素: 以河南省12个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17, 37(6): 151-155, 170. [Gao Genghe, Zeng Wenfeng, Liu Mingyue. Backflow loca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inter-provincial migrant workers: A case study for 12 villages in Henan Province.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37(6): 151-155, 170.]
- [7] 钱宏胜,朱宇,林李月,等. 中国流动人口的区域性回流及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J]. 地理研究, 2023, 42(8): 2089-2103. [Qian Hongsheng, Zhu Yu, Lin Liyue, et al. Regional return migration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ir locational selection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3, 42(8): 2089-2103.]
- [8] 杨菊华. 人口流动与居住分离: 经济理性抑或制度制约?[J]. 人口学刊, 2015, 37(1): 26-40. [Yang Juhua. Migration and living apart in China: Economic rationality vs. institutional barriers. Population Journal, 2015, 37(1): 26-40.]
- [9] 朱宇,杨云彦,王桂新,等. 农民工: 一个跨越城乡的新兴群体[J]. 人口研究, 2005, 29(4): 36-52. [Zhu Yu, Yang Yunyan, Wang Guixin, et al.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Spanning rural and urban areas. Population Research, 2005, 29(4): 36-52.]

- [10] 林李月, 朱宇, 林坤, 等. 两栖生计下中国流动人口城镇购房意愿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 [J]. 地理学报, 2021, 76(6): 1350-1365. [Lin Liyue, Zhu Yu, Lin Kun, et al. Spatial pattern and determinants of migrants' urban housing purchase intention under the binary-locational household arrangement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6): 1350-1365.]
- [11] 林李月, 朱宇, 林坤. 跨地区生计及其变迁视角下流动人口城镇住房分层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J]. 地理研究, 2022, 41(7): 1948-1962. [Lin Liyue, Zhu Yu, Lin Kun. Characteristics and determinant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urban housing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locational household arrangements and their change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2, 41(7): 1948-1962.]
- [12] Fan C C. Householding and split households: Examples and stories of Asian migrants to cities [J]. *Cities*, 2021, 113: 103147. doi: 10.1016/j.cities.2021.103147.
- [13] Chen C, Fan C C. China's hukou puzzle: Why don't rural migrants want urban hukou? [J]. *China Review*, 2016, 16(3): 9-39.
- [14] Wei Y N. Leaving children behind: A win-win household strategy or a path to pauperization? [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18, 59(2): 164-183.
- [15] Wen M, Lin D H. Child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Children left behind by their migrant parents and children of nonmigrant families [J]. *Child Development*, 2012, 83(1): 120-136.
- [16] Fan C C, Li T J. Familization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2011 and 2015 national floating population surveys [J]. *Area Development and Policy*, 2019, 4(2): 134-156.
- [17] 杨菊华, 陈传波. 流动人口家庭化的现状与特点: 流动过程特征分析 [J]. 人口与发展, 2013, 19(3): 2-13, 71. [Yang Juhua, Chen Chuanbo. The process of familization of migration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3, 19(3): 2-13, 71.]
- [18] 吴帆.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的迁移序列及其政策涵义 [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4): 103-110. [Wu Fan. Sequence of family migration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related policies in China. *Nankai Journal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6(4): 103-110.]
- [19] 扈新强, 赵玉峰. 流动人口家庭化特征、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 [J]. 西北人口, 2017, 38(6): 18-25. [Hu Xinqiang, Zhao Yufeng.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trend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loating population's family. *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 2017, 38(6): 18-25.]
- [20] Chen H S, Wang X P, Liu Y, et al. Migrants' choice of household split or reunion in China's urbanisation process: The effect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J]. *Cities*, 2020, 102: 102669. doi: 10.1016/j.cities.2020.102669.
- [21] 李强. 农民工举家迁移决策的理论分析及检验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24(6): 65-70. [Li Qiang. A theory analysis on the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24(6): 65-70.]
- [22] 白美妃. 撑开在城乡之间的家: 基础设施、时空经验与县域城乡关系再认识 [J]. 社会学研究, 2021, 36(6): 45-67, 227. [Bai Meifei. Family stretching between town and country: Infrastructure, spatio-temporal experience and urban-rural relations at the county level revisited. *Sociological Studies*, 2021, 36(6): 45-67, 227.]
- [23] 桂华. 城乡三元结构视角下的县域城镇化问题研究 [J]. 人民论坛, 2021(14): 64-66. [Gui Hua. Research on county urb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triplex structure. *People's Tribune*, 2021(14): 64-66.]
- [24] 贺雪峰. 农民进城与县域城市化的风险 [J]. 社会发展研究, 2021, 8(3): 11-20, 242. [He Xuefeng. The risk of farmers entering cities and county urbanization. *Journal of Social Development*, 2021, 8(3): 11-20, 242.]
- [25] 白美妃. 从婚房进城看中国城市化的逻辑 [J]. 文化纵横, 2018(1): 60-67. [Bai Meifei. The logic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from the marriage house to the city. *Cultural Review*, 2018(1): 60-67.]
- [26] 宋国恺, 陈欣蕾. 农民工城镇化转变: 从“乡—城”到“乡—县—城”: 以农民工落户城市层级选择意愿为视角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1(5): 74-84. [Song Guokai, Chen Xinlei. Urba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rural-urban" to "rural-country-urb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choose cities to settle in.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1, 41(5): 74-84.]
- [27] 王春光. 第三条城镇化之路: “城乡两栖” [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6): 79-86. [Wang Chunguang. The third way for urbanization: Residing between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areas.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9(6): 79-86.]
- [28] 朱战辉. 欠发达地区县域城镇化对农民家庭生计的影响机制研究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 146-154, 193. [Zhu Zhanhui. Study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county urbanization on farmers' family

- livelihood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1 (6): 146-154, 193.]
- [29] Pannell C. China's urban transition [J]. *Journal of Geography*, 1995, 94(3): 394-403.
- [30] Kelley A C, Williamson J G. Population growth, industrial revolutions, and the urban transition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4, 10(3): 419-441.
- [31] Zelinsky W. The hypothesis of the mobility transition [J]. *Geographical Review*, 1971, 61(2): 219-249.
- [32] Lin L Y, Zhu Y. Types and determinants of migrants'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China's new phase of urbanization: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J]. *Cities*, 2022, 124: 103622. doi: 10.1016/j.cities.2022.103622.
- [33] 朱谔君. 家庭连续体: 城乡融合进程中的农村家庭再生产 [J]. *宁夏社会科学*, 2022(6): 181-188. [Family continuum: Rural family reprod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Ningxia Social Sciences*, 2022(6): 181-188.]
- [34] 谢永飞, 梁波, 林莉华. “家”“业”可否兼得: 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研究 [J]. *热带地理*, 2022, 42(8): 1288-1300. [Xie Yongfei, Liang Bo, Lin Lihua. Can they have both "home" and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 research on return intention of young migrant workers. *Tropical Geography*, 2022, 42(8): 1288-1300.]
- [35] 韩淑娟, 颢慧玲, 武汉祥. 基于 Order Probit模型的家庭化流动影响因素分析 [J]. *经济问题*, 2017(1): 92-95. [Han Shujuan, Zhuan Huiling, Wu Hanxiang.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family migration in floating population based on Order Probit Model. *On Economic Problems*, 2017(1): 92-95.]
- [36] 吕青. 流动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过程及影响因素: 基于江苏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J]. *人口与社会*, 2018, 34(5): 94-101. [Lv Qing. Family Reunion proces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Based on 2017 dynamic monitoring investigation on floating popul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Population and Society*, 2018, 34(5): 94-101.]
- [37] 张海笑, 尹勤, 赵妍. 江苏省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模式分析 [J]. *经济研究导刊*, 2018(25): 56-57. [Zhang Haixiao, Yin Qin, Zhao Yan. Analysis on family-oriented migration pattern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Economic Research Guide*, 2018(25): 56-57.]
- [38] 高更和, 王玉婵, 徐祖牧, 等. 农民工回流务工区位研究: 以河南省45个村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12): 2083-2093. [Gao Genghe, Wang Yuchan, Xu Zumu, et al. Work location choice of returnee migrant workers: Case study of 45 villages in Henan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12): 2083-2093.]
- [39] 杨中燕, 朱宇, 林李月, 等. 核心家庭人口流动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J]. *西北人口*, 2015, 36(3): 18-22. [Yang Zhongyan, Zhu Yu, Lin Liyue, et al.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the nuclear family's migration. *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 2015, 36(3): 18-22.]
- [40] 诸萍. 家庭团聚: 家庭城乡属性与家庭化迁移的比较研究 [J]. *社会发展研究*, 2021, 8(2): 72-88, 243. [Zhu Ping. Family Reun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family urban-rural attributes and family migration. *Journal of Social Development*, 2021, 8(2): 72-88, 243.]
- [41] 彭璐, 朱宇, 林李月. 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的暂时性回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生命历程的视角 [J]. *南方人口*, 2017, 32(6): 1-13. [Peng Lu, Zhu Yu, Lin Liyue. The temporary return i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migration and their determinants: A life-course perspective. *South China Population*, 2017, 32(6): 1-13.]
- [42] Yue Z S, Li S Z, Feldman M W, et al. Floating choices: A generational perspective on intentions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0, 42(3): 545-562.
- [43] 郭雅琪, 高更和, 王玉婵, 等. 回流农民工预期购房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 以河南省45村为例 [J]. *地理科学*, 2022, 42(9): 1600-1608. [Guo Yaqi, Gao Genghe, Wang Yuchan, et al. Location choi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xpected apartment purchase for returned migrant workers: Case study of 45 villages in Henan Provi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42(9): 1600-1608.]

Separation, convergence, and urbanization of the residential location of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family members

GUO Zhuo^{1,3}, ZHU Yu^{2,3*}, LIN Liyue^{1,4}, KE Wenqian^{1,4}, QIAN Hongsheng^{1,3}

(1. Key Laboratory for Humid Subtropical Eco-geographical Process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uzhou 350117, China;

2. Asian Demographic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3. School of Geograph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4. Institute of Geograph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Abstract: The choice of residential location is an issue that migrant workers must face in the process of return migration, and its examin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of county area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604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in Tanghe County, Henan Province in 2022, this study us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s to explore the separation and convergence of the residential location of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family member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return migration.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family members of nearly 60% of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are still separated, either within the home county or in different counties. On the one hand, those family members separated within the home county frequently move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ial locations of the family, demonstrating a family residential pattern where members of the family are separated in residence but still united as a family unit. Such a residential pattern of family members not only promotes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but also is a prelude of eventual convergenc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ial locations of the family.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spects of family residential locations for those returning migrant families separated between two or more counties (with one being the home county) may be more diversified; they may eventually converge either in the place of origin (their home county) or in the place of destination (a place outside their home county). 2) Among those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families whose residential locations have converged in one place, half of them live in towns within the home county, realizing the goal of urbanization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providing stable human capital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However, the other half of the families who live in rural areas still adopt the livelihood strategy of part-time farming and part-time working in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which implies that their urbanization process is incomplete and therefore they have great potential to promote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their home counties. 3) Modeling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younger the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are, the smaller the number of family members, the higher the monthly family income, and the closer the residential location is to the center of the county, the greater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convergence of residential loc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family members. The modeling results further show that the higher the education level of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the smaller the number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the larger the size of the family labor force, the higher the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the longer the duration of migration and the time since return migration, and the farther the residential location to the center of the county seat, the greater the likelihood for the residential location of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families to converge in urban areas, and possessing owner-occupied housing promotes the convergence of their residential locations in urban areas.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formulate policies to guide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and promote in situ urbanization of their home areas.

Keywords: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family reunion; family separation; residential location; county area urbanization